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 的理论与实践

韩 雷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 理论与实践

韩 雷 著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栾建民

封面设计：章建人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韩 雷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政编码：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怀柔县黄坎印刷厂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32 9.75 印张209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 7—5017—1749—4/F·1149

定价：4.00 元

前 言

本书收集的是作者从1988年到1991年发表的论文。这个时期文章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体制改革，以及银行业务如何在改革中发展和前进的问题。内容是结合金融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对改革的模式、方法、步骤等进行研究和提出建议，着重于各种模式、意见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理论依据的分析研究，比较利害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所以题名曰《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1988~1991年期间，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个是在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力量与反社会主义力量斗争的背景下，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这是一次“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重大较量，以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而告终。一个是由于80年代后期各种经济矛盾积累的结果，1988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3年多的治理整顿，基本上制止了通货膨胀，实现了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国民经济重新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这两大事件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实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这个时期思想战线和经济战线出现了许多复杂情况，改革实践在前进中出现曲折现象，理论探索异常活跃并带有论战性质。复杂的斗争环境，促使人们进行思考、学习，在实践中深入地探索真

理,寻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准则,于是在我国又重新出现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这无疑将会成为正确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的巨大推动力。

在上述背景下,这个时期在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和理论活动中,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重大分歧和反复论争,例如:在我国金融体制问题上,是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制,还是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制”?在金融宏观调控问题上,是中央银行独家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还是在中央银行领导下,由中央银行和国家专业银行在调控内容的不同层次上,分工合作、合力完成宏观调控任务?在国家专业银行的性质问题上,它是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还是担负政策任务、实行企业化管理,独具特色的我国国家专业银行?在国家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任务与企业化管理的关系问题上,是选择划分政策性银行与经营性银行的途径解决,还是采取改善外部条件,使政策性任务和企业化管理能够统一在国家专业银行身上的途径解决?在国家专业银行的企业化管理问题上,是实行以财务承包为核心的经营责任制有利于在金融领域中形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是相反?在货币流通问题上,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币值、发展经济”呢,还是应当以“稳定币值”为目标?治理通货膨胀时,控制投放的重点是现金还是“存款货币”?采取的控制措施主要应针对农村还是城市?在信贷计划管理和资金管理问题上,是单纯强调由中央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实行分级管理、横向调剂呢,还是应当实行年

度计划和资金安排以系统的纵向安排为主，日常业务经营资金余缺，以面向市场、横向调节为主，这样一种纵横结合的管理体制？在各专业银行的业务范围问题上，是按专业分工，“井水不犯河水”好，还是“一业为主，适当交叉，因地制宜”，更有利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中央银行如何加强对专业银行的领导问题上，是加强调查研究、进行政策领导、“依法管理”呢，还是加强行政管理权力，象专业银行系统的上级行那样领导和管理各级专业银行的人财物和业务活动？在专业银行系统管理问题上，是继续实行“三级领导、一级经营”呢，还是各级管理行都应该经营业务？是适当放权，使实际经营的银行单位有条件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及时作出反应呢，还是沿用治理整顿时期的应急措施，实行“指标管理”、“专户管理”、“戴帽下达专项贷款”、“收支两条线”、“多存不能多贷”等办法，使经营单位只能面向上级，不能、也不必面向市场？在农村资金问题上，是单纯依靠国家投入，还是以农民投入为主，同时努力实现国家向农业倾斜的财政、金融政策？在农村信用社改革问题上，改革目标的不同依然是障碍改革深入下去的主要问题，是以恢复合作金融的本来面目为改革目标，还是维持各地农村信用社实际上有些是集体所有制的金融企业、有些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有些是地方银行的不同“现状”？以及如何实现对各类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实行“分类指导”等等。这些争论，主要是属于由各种原因形成的不同认识的意见交流。当然，这些争论也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印记，不可能不反映对那些否定公有制的优越性的议论和“全盘西化”风的争论，不可能不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

作者参加了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并且学习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我国的经济情况和金融情况，研究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力图分清哪些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哪些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又是现阶段我国可以采用、甚至是不得不采用的东西，哪些虽属社会主义性质但现阶段我国不应甚至不能实行的东西。并且从银行业务和改革的发展情况以及经验教训中，进行实证研究；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各个有关过程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分析和说明。主观愿望是要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分清路线是非。

最近时期，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苏联的瓦解和东欧国家发生巨变，一些国家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这种事态的发展，对我国思想理论界会有一些冲击，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在理论活动和实践斗争中，需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能忘记国际、国内都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贯彻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时，不能忽略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外来投资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没落、反动的东西也要向我国大量涌来；在努力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使改革、开放能更好地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对上述目标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我愿借此机会，对本书出版过程中，在资料收集、整理、校印、编辑等方面给我以巨大而无私帮助的马茹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韩 雷

1992年5月11日

目 录

前言

贫困地区振兴经济的道路 (1988 年 9 月)	(1)
农村金融工作的回顾 (1988 年 10 月)	(19)
怀念 (1988 年 10 月)	(35)
关于“改革所有制”问题的面面观 (1989 年 1 月) ...	(43)
金融体制改革的启示 (1989 年 4 月)	(56)
农村资金问题透视 (1989 年 6 月)	(75)
在中国农村金融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1987 年 7 月)	(93)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论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症 结(1989 年 9 月)	(108)
在金融体制改革中要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 (1990 年 1 月)	(123)
专业银行应当坚持企业化经营的改革方向 (1990 年 4 月)	(140)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90 年 7 月)	(154)
货币流通与货币政策 (1990 年 8 月)	(166)
治理整顿时期利率政策的探讨(1990 年 9 月)	(206)
治理整顿时期对若干问题的思考(1990 年 10 月)	(215)
不发达地区经济起飞有赖于商品经济的普遍启动(1990	

年 11 月).....	(229)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1991 年 2 月)	(237)
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深化改革的思考(1991 年 3 月)	
.....	(242)
四川调查拾零(1991 年 5 月).....	(260)
论执行政策任务与实行企业化管理的统一(1991 年 9 月)	
.....	(269)
金融体制改革的困惑(1991 年 11 月)	(287)

贫困地区振兴经济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帮助贫困地区人民发展经济，解决温饱问题，陆续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贯彻执行，农村金融界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发放了各种优惠贷款，这些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帮助不少贫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少数人已经脱贫致富。但总的说来，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已取得的脱贫成绩也不够巩固。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对中央的有关政策理解不深，掌握不准，贯彻不得力。贫困地区的特点以及如何脱贫致富问题，从现象看各不相同，要解决贫困地区的个性问题，需要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微观领域内，在具体工作中解决。贫困地区的共性问题则是更为深刻的带有本质性的问题，只有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找到一条切合我国贫困地区的情况和特点，合乎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振兴经济之路。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探索一条使贫困地区的经济能扎扎实实地发展，贫困地区人民生活能够持续提高，贫困地区的商品生产有一个普遍的启动，并且能够有效益地、持续地发展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

认为从思想认识到实际工作中正确解决下列问题是必要的。

一、发展商品经济是改变贫困地区经济面貌的唯一途径

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是农民陷于贫困的根源。在解放前，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农民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用原始的劳动工具，进行简单再生产，还要忍受繁重的徭役和地租剥削，这时农民只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全国解放后，很快就从“耕者有其田”转变为土地国有化，在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在国有土地上，进行集体劳动，计工分配，这种生产方式，超越了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农民还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结果劳动生产率降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分配，一个劳动日只值几角钱，农民依然摆脱不了贫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了，农民可以长期使用自己承包到的国有土地，可以自由种植，收获物除上交提留和税款外，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具备了进行商品生产的基本条件，开始进入市场，这样，农村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农民的生活也逐步得到了改善。但是，贫困地区由于可耕地少，土地贫瘠，交通蔽塞，特别是兄弟民族聚居地区绝大部分是山区，每户拥有的耕地少，生产技术落后，产量低，自给都困难，没有多余的产品可以拿出来交换。同时，由于没有其它生产门路，这些地方的农民只能依附在土地上，从事农业劳动，进行简单再生产，过着自给半自给的经济生活，也没有条件产生对商品的更多需求，这种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阻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给经济思想的破除，妨碍了商品意识的产生，现在很多兄弟民族还以出售自己的产品为耻，不敢公开进行，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要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面貌，必须千方百计地、从

各个方面帮助农民群众摆脱自给自足的思想束缚，建立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意识。首先要根据现实条件，帮助农民提高他们所从事的农、林、牧、副、渔生产的产量和质量，农民有了剩余产品，才能进行交换，才有必要进入市场；第二，要搞好水陆交通，使农民想卖的东西能运销出去，想买的东西能运得进来；第三，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引导和帮助农民建立集市，建立多种专业市场，使商品交换能够集中进行，产销双方能够见面；第四，要搞好供销合作，允许私营商贩合法活动，农民脚短，没有中间商进行长短途贩运，商品经济也是发展不起来的；第五，要组织工业品下乡，首先是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的生活必需品，也包括各种属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工业品，使农民能买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并且产生更多的消费欲望，千百万农民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欲望，是促使农村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内在动力，也是摧毁自然经济传统思想堡垒的最有力的武器；第六，提供市场信息服务。“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农村表现得最明显和有效，但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正在改革过程中，各种扭曲现象很多，市场常常会发出错误的信息，农民照此生产就会造成损失，各地有关领导部门要做耐心工作，要对农民生产进行指导。过去政府部门一般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和经营企业上，体制改革后，职能要转换，主要精力应该转移到对当地经济生活的引导和组织方面，也就是要做好上述几个方面的工作，以推动贫困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主要涵义，是要农村的每一个经济单元（现在是家庭）都转到为卖而买的轨道上来，根据市场需要而生产，这样，农民就可以从他出售的数量日益增加的商品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他们的生活就会逐渐富裕起来。这种效果不是国营或

集体举办几家企业就能得到的。现在党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不要忘记，只有形成商品经济能够普遍启动的环境和机制，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的条件下，一部分人才能先富起来。

二、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经济必须认真发挥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

贫困地区交通不便、技术落后、资金缺乏、市场信息不灵，发展商品经济的起点很低，与发达地区的条件相比差距很大，产品也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过去常常把希望寄托在中央和省市来投资建厂，在税收、贷款、利率方面给予照顾。但是，国家能投入的资金是有限的，并且也只能在点上帮助建些工厂，修一些交通、水利工程，在草原搞一些“草库伦”等等，希望用这些措施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工作无疑是有益的，并且也产出了一些好效果，但它始终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只能局部地在某些地方、某个环节上起有限的作用。能不能在贫困地区农民群众本身找到发展商品经济的内部力量？怎样才能挖掘出农民群众发展商品经济的活力？办法是有的，这就是发挥私营经济在发展商品生产中的积极性。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众是小生产者，是小私有者，他们同样有过好生活的愿望，同样希望通过自己积累财富来实现这个目的，同样会产生搞商品生产的冲动，同样会循着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的途径发展，并渴望有更多的产品出卖，以便赚到更多的钱，可以说，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本身天然地蕴藏着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过去由于我们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集体劳动，按分计酬；限制农民、甚至禁止搞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些做法压制了农民搞商品生产的积极性。现在中央已经明确：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可以合法经营。压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强烈愿望上面的石板一旦真正掀开，作为小私有者、小生产者的农民通过搞商品生产而发家致富的力量和智慧就会迸发出来，他们就会根据本身条件，最大限度地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发展商品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场地、劳力、产销关系等问题。现在农民是靠银行贷款进行生产，到那时，银行贷款只起一种“助燃剂”作用就可以了。这方面的成功事例各省市都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温州。值得深思的是温州的成功经验，至今还未能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主要原因是有一些认识问题还没有解决。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已经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又让私营经济发展，那是倒退。对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比较看法，应当以能否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为准绳，应当有历史观点。原始共产主义是公有制，那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集体劳动，集体占有，但那时社会生产力很低，甚至不能保证经常能维持人们生存所必需的食物，所以它终于为私有制所取代。私有制贯串人类社会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和它伴生的阶级、剥削、战争以及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现象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数不清的苦难，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日益增加的物质财富，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说私有制优于原始公社的那种公有制是毫不为过的。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恩格斯一道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完全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公有制

社会，这样的公有制社会将能更有效地发挥人类的一切智慧和潜力，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高到更高的境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象马恩所预期的那样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反而在一些经济落后、但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样，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不首先挖掘一切积极因素来谋求提高社会生产力，然后才有可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这些积极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私营经济在发展商品生产中的积极性，要敢于利用私营经济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只有利用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来发展壮大公有制，才能最终抛弃私有制，这也就是我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要论证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挥私营经济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是前进不是倒退。

有些同志认为：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就会造成“两极分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我们不当把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同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利用私营经济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户能普遍启动搞商品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允许恢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把我们现在在政策上允许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内的雇工剥削现象存在，理解为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复活。

在经济学界中有些同志为了证明现在允许私营经济合法经营的政策是正确的，就力图证明现在的雇佣劳动不是剥削，如果雇佣劳动不能产生剩余价值，任何私人雇主就不会有兴趣雇工经营了。雇佣劳动就是剥削，不过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有必要容忍这种在

一定程度内的剥削存在而已。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人不敢发展私营工商业，但也有人积极要求银行对私营大户大量贷款，帮助他扩大经营。如果这样做，那就真正是朝着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大“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了。我们银行一贯主张：银行贷款只支持私营工商业起步，以后得靠他们自己的资金积累和劳动积累，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发展。我们绝不以国家的信贷资金支持私营大户无限扩大经营范围和剥削规模。我们的指导作用在于：在小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引导它们走上合作经营的道路。

三、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要因势利导，发挥优势，从发展农林牧副渔开始

现在谈到发展商品生产，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办法一般都是办厂。但是恰恰是贫困地区缺乏办厂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并且交通不便，消息蔽塞，困难重重，于是就寄希望于国家投资，银行贷款。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项目，认真的可行性研究，可靠的经济效益，贷款也借不到；即使勉强办起几个厂，如果不是扎根于本地资源，具有别人没有的优势，企业也站不稳，对于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也不可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最切实可行的办法，首先应当是根据当地条件，发扬自己的优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渔则渔，提高耕作和养殖技术，向农、林、牧、副、渔生产的深度进军，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使贫困地区有更多的农、林、牧、副、渔业产品出售，能够卖得好价钱，能换回更多自己需要的商品，这是贫困地区步入市场的捷径。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为建立农、林、牧、副、渔产品的初级加工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为建立有关的第二、第三产业准备了资金、技术、经验和人才，不但是